

社会变迁中的雪隆潮州会馆： 历史、奋斗与成就

莫顺宗（新纪元学院注册主任）

摘要

本文为一个个案研究，旨在探究雪隆潮州会馆的贡献与局限，并期望由点到线，可以梳理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网络的部分脉络。自独立后，华人社团，尤其是乡团，一般无法适应快速变迁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其重要性迅速下降。数十年来，华人社会呼吁乡团改革的声音此起彼落，但大部分华人乡团几乎维持不变。因此，越来越多人相信，乡团早晚会被时代淘汰。但本文探究的个案，却是少见的例外。雪隆潮州会馆，成立百多年来，总会随时局的转变，而作出相应调整，与时俱进。为掌握雪隆潮州会馆变化之迹，本文分三个阶段探讨它自创立至今的奋斗，以及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潮州人、雪隆潮州会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社团研究

Clan Associ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

A Study of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Teo Chew Association

Mok Soon Chong (Registrar, New Era College)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the contributions as well as limitations of the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Teo Chew Association in particular, and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of Malaysia in general. The role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has rapidly diminished after the achievement of independence in multi-racial Malaysia. For years,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have been openly advised by the Chinese society to effect changes to enhance their survival, but most of them remain indifferent. Consequently, more and more people tend to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will fade into history sooner or later. However,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till a few exceptions. Using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Teo Chew Association as a case study, one finds that throughout its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numerous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association from time to time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day. To trace the changes made by the association, this study divides its working experience into three main phases, each dealing with a definite stage of social evolution related to political developments.

Keywords: Teochewese,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Teo Chew Association, Malaysia Chinese associations, Chinese association study

一 前言：华团网络里的雪隆潮州会馆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简称华团）虽然数以千计，然而一般的看法却视之为一个整体，而非许多个体。这是因为华团虽然名目繁多，不过对华人社会的事务，从立场到行动，一直皆无二致，从这个角度视之，确实可以称它们为一个整体，或所谓的“整体网络”。¹何况，马来西亚华团之间不仅关系密切，其中一些甚至自觉地组织联合会，这更加强了华团是一个“整体网络”的印象。

但必须强调，每个华团都是由华人社会的不同社群组织而成，主观上拥有各自的存在意义，而且在组织的运作上，也绝对独立自主，在服务华社的大前提下，虽有共同的目标，却也有个别的奋斗经历。不仅如此，华团的性质其实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共同点在“华”，而在“团”方面，则有乡会、商会、校友会、宗亲会等的区别。因此它们的服务对象虽是华社，关心的重点却各有不同。至于每个华团组织的大小，动员能力的强弱，成立历史的长短，更是不尽相同。当然，这里指出华团内部的复杂情况，并不是否定在概念上将华团合而为一个“整体网络”的做法，只是强调当我们视华团为一个整体的同时，绝对不能忽略华团其实由始至终都是各别存在的事实，至少在研究上，不能仅仅只有一以贯之的整体研究，而没有化整为零的个案研究。

本文的研究对象，雪隆潮州会馆，在马来西亚华团中绝对不能和以捍卫华文教育而闻名的董教总，或统摄全州所有华团的中华大会堂，甚至凝聚华商共探经济的中华商会，相提并论。雪隆潮州会馆并没有左右华社的影响力。但这个组织所属的乡团类型，却是马来西亚华团中，时间上产生得最早，数量上积累得最多的。华人移居南洋各地，每一个地区的方言群，不论人数多寡，几乎都成立各自的乡团，以照顾同乡福利。然而，时过境迁，近数十年来乡情日渐淡化，乡团组织自然无可避免面对是否还有存在价值的质疑。华人社会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心理下，经常发出乡团必须寻求改革、与时俱进等的呼吁。不过在错综复杂的华团里，革新无疑是知易行难的事。何况，所谓革新早已是华团的共识，真正的情况是大多数的华团都已经或多或少，或自觉或被动，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更。问题是其成效的大小而已。本文正是企图通过对

1 陈亚才，〈社团网络与核心功能〉，《南洋商报》，1999年5月14日。

雪隆潮州会馆的个案研究，探寻在地缘组织先天条件限制下，一个乡团如何在马来西亚华团的大网络里，寻找新的出路。

我们选择雪隆潮州会馆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当然因为它是马来西亚华团地缘组织的佼佼者之一。雪隆潮州会馆创立于1891年的中秋节，百多年来一直紧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发展，对华社的问题与诉求，经常能够作出适当的响应，像这样的乡团，其实不多。当然，必须强调，正如其它的乡团，早期的雪隆潮州会馆是以潮州同乡为服务对象，潮社重于华社。但近数十年，随着时局与环境的变迁，省籍观念逐年淡薄，雪隆潮州会馆应时势之需做出调整，推动的活动已不仅局限于同乡会之内了。其实，华人乡团跨出旧有框框，是今天华社的共同呼声，但令人失望的是，许多华人乡团对这样的召唤，始终裹足不前。雪隆潮州会馆于此可谓良好模范。同时，在活动上，雪隆潮州会馆虽也避免不了举办千篇一律的公式化活动；但相对于大多数马来西亚华团，雪隆潮州会馆对服务华社，尤其是对文教工作的承担，显示了更大的进取心。从雪隆潮州会馆创办培才学校，并且在建校八十年来，一直领导该校董事部，为学校的建设出钱出力，最终使培才发展成为雪隆区著名华文小学，即可看得出来。兴办华文学校之余，雪隆潮州会馆在其它华人文化建设上，亦不时展示极具创意的心思，譬如三十年前，它首开马来西亚华团先河，为出书不易的马华学者与作家，设立学术文化出版基金，就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以雪兰莪和吉隆坡的潮州人数衡量雪隆潮州会馆，它的表现确实是特别值得赞扬的。潮州人无论是在雪兰莪或吉隆坡，和其它籍贯华人比较，人数并不多，其占华人人口的比例从未超过百分之十。² 不过雪隆潮州会馆，百多年来都能与其它人口比例更高的华人之会馆组织鼎足而立，论表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但如此，更难得的是，作为一个活跃的团体，雪隆潮州会馆并没有将代表性局限于雪隆区的潮人，或是华人。事实上，除了积极通过本身的组织为同乡以及整体华人服务以外，雪隆潮州会馆于此同时不断与其它拥有相同性质或共同目标的华团合作，组织区域性或全国性的联合会，逐步建设更大的华

2 郑良树：〈潮州人之人口及其分布〉，《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丛（卷一）》，新加坡：南洋学会，1982年），页55-77。

团网络，以扩大其角色的发挥空间。其中加入吉隆坡广东义山、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等更高层次的华团组织，使雪隆潮州会馆成功融入马来西亚华团的大网络，突破原来组织的限制，能以更多身份和面貌参与华社事务。譬如作为吉隆坡广东义山的一分子，雪隆潮州会馆的代表，能够在困扰华社多年的义山搬迁课题上，出任华社代言人，直接与当权者周旋，使雪隆潮州会馆间接成为华社权益的捍卫者。因此，可以这么说，雪隆潮州会馆从一个乡团的理想出发，以同乡的安身立命和民族的文化遗产为使命，然后立足于这个基础上，与其它华团合纵连横，建设更大网络供其角色的延伸，最终强化它作为一个乡团的作用和地位。这意味着通过对雪隆潮州会馆的研究，我们不但可以探测一个百年乡团为华社积累的功绩的厚度，也可以依循它所建设的华团网络，梳理出几千个盘枝交错的华团的部分脉络。本文的讨论主要将根据这两方面而展开。

另外，必须强调，对雪隆潮州会馆的研究必定不能将之孤立于整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大背景外。因为，雪隆潮州会馆虽小，但在马来西亚华人为民族权益奋斗的过程中，它可以比喻为其中一个擅于冲锋陷阵的华团尖兵。这个华团尖兵见证和参与了吉隆坡开发、日据、独立、五一三种族冲突等重大的历史事，它的历史就是百多年来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缩影。因此，下文将紧扣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以华社百余年来经历过的几个历史转折为根据，分三个阶段论述雪隆潮州会馆作为一个华团尖兵的奋斗和成就。

二 浓浓乡情：从创立到日据时期

雪隆潮州会馆的成立地点是在今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吉隆坡本来属于雪兰莪州，雪兰莪是马来西亚近几十年来建设得最好的州属，但它的开发其实于十九世纪初叶才开始，比任何一州都迟。³ 雪兰莪州的开发，是因为锡矿的关系，而开矿当然少不了华人的参与。最早到雪州开矿的是客家人。⁴ 雪州的矿业，最初只是限于芦骨一带，后来扩大至州内其它地区，吉隆坡就是于1859年因锡矿的开采而开发成为一个小村镇。1866至1873年，雪州发生八年内战，内战期间，各项发展全面停顿，但战后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尤其是英国人在战争结束不久，趁机接管雪州政权，州内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十九世纪末期的雪兰莪社会，已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且趋于繁荣，

尤以工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更为显著”。⁵其中吉隆坡地区的表现最为特出。众所周知，吉隆坡战后仍由1868年出任甲必丹的叶亚来，继续负责行政工作，当他于1880年将行政权力移交英殖民政府时，吉隆坡已经崛起成为雪州，乃至整个马来半岛，最重要的城镇之一。正是这个时候，潮州人开始移入雪兰莪，特别是日渐繁荣的吉隆坡。

潮州人移居雪兰莪的目的，相信是为了经营米粮生意。从十九世纪开始，马来半岛、新加坡与暹罗的米粮生意主要掌控在潮州人手里。⁶因此，可以想像，随着雪兰莪工商业日益蓬勃，再加上吉隆坡的城市化急速形成的情况下，一定吸引不少潮州米粮商人到此经商。到了1891年，移植吉隆坡，以及雪兰莪其它地区的潮州人，必定已有相当的数目，因为这一年雪隆潮州会馆于吉隆坡宣告成立。⁷这个会馆最初命名为雪兰莪潮州八邑公所。八邑是指潮安、澄海、潮阳、揭阳、普宁、惠来、饶平及丰顺。客语系的大浦没有包括在内，原因可能是更早移居到雪兰莪的大浦人，已经于1878年成立了本身的地缘组织。当然，方言的回异，使大浦人一般上都倾向自立门户，所谓“浦不入潮”，这种情况非雪兰莪潮州人独有。

雪隆潮州会馆刚成立时，会所设于吉隆坡谐街一座两层的楼房，门牌一七五号。楼下大门上，有一横匾，上书“八邑公所”。雪隆潮州会馆的首任总理为余来标，继之者为陈玉波，第三任则为杨作荣。关于这三位总理的背景，我们一无所知，不过相信他们都是成功的潮籍商人，事实上，他们之后的雪隆潮州会馆主要领袖都是商人，这与其他乡团组织的情况类似。⁸至于他们的领导，我们也所知不多，只知道他们“相承领导所务，垂二十余年，在任期间，各有建树，历历在目，同乡咸称贤焉”。⁹得知，甚至连他们的“任期各为若干年，均无档案可稽”。¹⁰这二十年数据的缺乏，同时也使后来者难以探究雪隆潮州会馆于此期间与其它华团的联系。十九世纪末的雪兰莪，已经有华团筹

3 许云樵，〈中华民族拓殖马来半岛考〉，《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1977年），页544。

4 同前注。

5 李业霖，〈雪兰莪历史概述〉，《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页245。

6 尹汉斌，〈潮州人卖米，路长情更长〉，《星洲日报》，1994年11月22日。

7 舒庆祥在他的著作《走过历史》中，指出潮州人大规模移植吉隆坡是于1891年，但他没有对此详加说明，相信是根据雪隆潮州会馆成立之年份，而有此说，见舒庆祥，《走过历史》，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页51。

组联合会。吉隆坡广东义山就是由雪兰莪州广东省各府州县的会馆联合建立而成的。它的意义显然超越一般的义山，因为“此一义山的建立，可以象征本州岛广东省人各帮派人士的大团结。”¹¹今天雪隆潮州会馆是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但当时它于此组织之贡献为何，是很值得探讨的。可惜这方面的记录，却是一片空白。我们连雪隆潮州会馆，是否于这段期间加入成为吉隆坡广东义山的一分子，都不能确定。¹²

相较而言，有关第四任总理杨敬好的记录显然远为详备。杨敬好的任期极长，据雪隆潮州会馆馆史记载，他上任于1910年前后，卸任于1936或37年。¹³由此推算，杨敬好在任大约四分之一世纪左右，任期之长，至今无人可以比拟。杨敬好不仅任期无人可比，他的表现在早期的雪隆潮州会馆诸领导人之中，也是难逢对手的。杨敬好对会务非常热心，特别是1920年代以后，雪隆潮州会馆在他的领导下渐渐走上轨道。1923年，雪隆潮州会馆接受黄实卿的建议，创办培才学校，推动华文教育。乡团兴学办教，当时早有先例，在吉隆坡，惠州会馆于1914年已经创办循人学校。¹⁴创办学校虽然可以造福华侨子弟，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雪隆潮州会馆的领袖此后一直为培才学校的发展费尽心思。培才学校最初附设于八邑公所，第一年学生三十人，第二年倍增至六十人，此后学生年年有增，雪隆潮州会馆会所的空间很快就不敷应用。1928年，杨敬好经同乡朱嘉炳介绍，承购安邦路一间别墅，改建为新会所。1929年，雪隆潮州会馆乔迁，培才学校也搬入新会所。同年，经过理事会议研究，决定修改章程，将“雪兰莪八邑公所”易名为“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1984年，因为吉隆坡脱离雪兰莪而成为中央政府直辖区，才改为今天的“雪隆

8 谢爱萍，〈潮州商人对马来西亚文化之贡献〉，郑良树主编，《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989-1000。

9 《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八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1977，页18。

10 萧宏骏，〈本会历年大事录要〉，《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八十四周年纪念特刊》，页29。

11 陈铁凡，〈雪兰莪金石文录要〉，《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页285。

12 雪隆潮州会馆也许并没有参与吉隆坡广东义山的创办工作，而是后来才加入为一分子，因为1923年置立的吉隆坡广东义山碑记，臚列了创立此义山的各大帮派领袖的名字，只缺潮州帮的代表人物，见同前注。

13 关于杨敬好卸任年份，各类雪隆潮州会馆馆史，有两种不同的记录，一说1936年，一说1937年。这种歧异甚至出现在同一本刊物里，如《雪隆潮州会馆百周年纪念特刊》收录的〈雪隆

潮州会馆”。

1929年的修改章程，亦将“总理”名衔改为“会长”，杨敬好因此成了首任会长。在新的形象下，雪隆潮州会馆更是大步前进，不久即发现新会所的空间也不足以应付日渐扩大的会务，以及持续增加的培才学校学生，于是以杨敬好为首的理事会，于1933年决定将会所扩建成宏伟壮观的大厦。为筹募扩建工程费用，雪隆潮州会馆多方设法，其中包括发售有奖彩券，而杨敬好作为会长，虽然已经“须发鬓白，年届古稀”，仍然四处奔波，甚至亲自远到新加坡、檳城、怡保、马六甲、柔佛各地，请求当地潮州会馆代售彩券。¹⁵ 1934年，雪隆潮州会馆大厦终于建立起来。这座大厦至今依然是雪隆潮州会馆的会所，可见当年杨敬好等人的盛举，已为日后会馆的发展奠下稳固基础。

杨敬好在推动会务之余，对雪隆潮州会馆与其它华团的联系，亦贡献良多。1923年，雪兰莪华团领袖发起筹组华人最高机构，即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杨敬好就是发起人之一，而雪隆潮州会馆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成立以后，一直都是重要的成员。但必须指出，当时雪隆潮州会馆或杨敬好参与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筹组工作，极有可能是因为朱嘉炳拉拢的结果。朱嘉炳是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成立的策划人，身为潮州人的他虽没有积极参加雪隆潮州会馆的活动，但他与杨敬好等雪隆潮州会馆领袖应有密切往来，前述他介绍杨敬好购买安邦路别墅，就是很好的例证。¹⁶ 这里提及朱嘉炳，主要是想说明雪隆潮州会馆当时加入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以及杨敬好成为该堂的发起人，可能并不是杨敬好主动促成。事实上，杨敬好比较感兴趣的应该是在雪隆潮州会馆或与潮州同乡有关的事务。1934年，马来亚潮州公会联合会的成立，他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前所述，1933年杨敬好到全马各地发售兴建雪隆潮州会馆大厦有奖彩券，而在发售彩券的同时，他与各州潮州会馆有了较密切的联系，他感觉马来亚潮人众多，潮州会馆也有数间，应有一个总的机构，以资联系，互通声气，于是倡议筹组一个全马潮州公会联合会。¹⁷ 杨敬好的倡议得到各州潮团的认同，马来

14 刘崇汉，〈独立前华人乡团组织〉，林水水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页363。

15 潘醒农，〈我的祝愿：献给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钻禧纪念特刊〉，《潮侨溯源集》，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3年，页153；潘醒农，〈马潮联会简史〉，《马潮联会金禧纪念特刊》，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1984年，页32。

亚潮州公会联合会即于翌年宣告成立。值得一提的是，马来亚潮州公会联合会于1934年成立时，乡团组织联合会，尚未成为潮流，当时仅有1929年成立的南洋客属总会以及同于1934年成立的南洋琼州总会。¹⁸由此可见，全马潮州社团网络能够在那时即已成形，为马来亚各州潮人乡情的联系提供管道，杨敬好无疑是大功臣。

毋庸置疑，早期的乡团组织都是充满浓浓乡情的。杨敬好卸任之后，陈本初接任为会长，他领导的雪隆潮州会馆亦是以雪隆区与马来亚各地同乡，以及中国潮汕原乡的人与物为最主要的关心对象。陈本初于1936或1937年上任不久，日军正式掀开侵略中国的序幕。1939年，日军侵入潮汕，兵祸之余，潮汕恰巧又碰上旱灾，居民生活惨不堪言。雪隆潮州会馆及马来亚各地潮团，纷纷发起救乡运动，筹款救济。据一位会员后来回忆，雪隆潮州会馆当时为星马总联络处，“嗣各地区分别筹得义款巨万，遂开会选派代表三名，携款假道香港转入潮汕放账。本会馆派麦宏泉校长为代表，会同星洲代表张君，檳城代表王袂君，联袂前程。”¹⁹这是陈本初上任后最重大的事，可惜就在这一年，陈本初因健康问题而呈辞，接任者为郑则民。1939年，国际局势日益紧张，英国就在这一年向德国宣战，雪隆区华团总机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决定筹款援助英国，雪隆潮州会馆在新任会长郑则民的领导下亦积极配合。这说明了华团在关怀祖国之余，对所居地政府事务，也非常热心。当然，相较之下，在当时华侨社会，祖国原乡还是居于首位。华人的这种心态，一直到战后，马来亚迈向独立建国，才有明显转变。二战期间，马来亚华人最关心的是中国的抗日。1941年杪日军挥军南下，占据马来亚，对华人尤其肆意蹂躏，劫掠杀戮，无恶不作，雪隆潮州会馆的会务，一如其它绝大部分的华团，完全无法展开，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一共冬眠了三年八个月。

16 朱嘉炳后来受委为雪隆潮州会馆名誉会长，可见他对这个组织的贡献极大，见〈名誉会长遗照〉，《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八十四周年纪念特刊》，页5。

17 同前注。

18 刘崇汉，〈独立前华人乡团组织〉，页362。

19 杨晴川，〈本会馆大事录要补遗〉，《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八十四周年纪念特刊》，页39

三 落地生根：迈向独立与建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英国重新实行殖民统治，雪隆潮州会馆恢复活动，由郑则民继续担任会长。当时马来亚各州百废待举，但雪隆潮州会馆的会务却在极短的时间内正常运作。以培才学校为例，日本撤退一个半月后，即1945年10月1日就已经开始复办。这是吉隆坡地区最早复办的华校，所以学生如潮涌至，即使分上下午班，附设于会馆内的教室，也难以容纳。这种情形持续数年之久，1952年会长郑则民召开全体董事及赞助人大会，决定筹款置建校舍，获得同乡热烈支持，募得捐款七万余元，加上郑则民个人捐献二万元，共计九万余元。雪隆潮州会馆利用这笔款项，购置位于锡兰巷的一栋花园洋楼。经过修葺布置，辟教室六间、礼堂一座，以及图书室、会客室、校务处、贩卖部、大草场、篮球场、羽球场等。这样一来，培才学校不仅拥有自己的校舍，而且其设备显然已是新式学校的规模，使学校此后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余地。

培才学校的逐步发展，证明雪隆潮州会馆对华文教育的贡献，而郑则民作为会长绝对居功至伟。雪隆潮州会馆对华文教育的热忱，也可以从支持南洋大学的创办看得出来。1953年初，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正式倡议创办南洋大学，新马华人上下一心，轰轰烈烈进行筹办南洋大学的活动，雪隆潮州会馆也参加作为南洋大学的会员。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是当时华社的全体活动，雪隆潮州会馆只是其中一个参与者。当时华社支持华教的热忱，反映华人在这片土地扎根的决心。华人社会此时正积极支持马来亚争取独立的运动，华社的想法是，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国家的建立是并行不悖的。因此1957年马来亚获得独立，华人也欣喜不已，雪隆潮州会馆特别成立一个五人委员会，筹备参加庆祝8月31日的马来亚独立大典。不过，马来亚独立之后，华文教育处境跟英殖民政府时期一样，仍然受到当权者的压迫。华文小学的母语教育在华社坚持下，局面尚能维持，但教育制度，已经改变，各语文源流之小学，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以内，教师薪金由州教育局负责，学生全部免费，只是管理学校的权力大部分落在教育部手中。“培才学校鉴于潮流所趋，亦接受改制，从此董事会只负责管理校产，督促校务，以及其它琐事。”²⁰

郑则民的领导一直持续至1959年他病逝为止，前后共有二十年，是杨敬好之后，任期最长的会长。郑则民逝世后，1960年黄盛源当选会长，但却于同年因健康关系告假休养，由副会长陈锦鸿署理会务。1961年张汉三膺选会长，雪隆潮州会馆领的方向与独立前颇有不同，“由这年开始，为配合国家独立后新形势的发展，进行兴革的事务良多”。²¹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雪隆潮州会馆非常重视与政府的和睦关系，1961年雪隆潮州会馆负责主办马潮联会代表会议，就是邀请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主持开幕。另外，雪隆潮州会馆与当时的华团一般上积极表现爱国热忱，1963年委派代表出席雪兰莪州华人社会学校代表大会，推动筹募“爱国基金”，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于会务的推展，张汉三领导的雪隆潮州会馆对教育依然非常重视。1962年即倡设雪隆潮州会馆中学奖学金，并于1965年开始颁发，接着又颁发会员子女学业优秀奖。至于对培才学校的协助，雪隆潮州会馆更加义不容辞。培才学校1952年迁入锡兰巷的校舍后，发展迅速，1961年总班数由当初的六班增加至二十班，学生则达到八百余名。²² 1961年张汉三捐资一万五千元，购置巨型新校车一辆，供学生搭乘之用，协助解决学生校车拥挤与破旧的问题。²³ 至于与其它华团的联系，雪隆潮州会馆建构的华团网络逐步扩大，除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亚潮州公会联合会、吉隆坡广东义山，也委派代表出任南洋大学雪州委会常务委员，并积极资助和参与推展吉隆坡同善医院院务的工作。

张汉三领导雪隆潮州会馆期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于1964年创立青年团。青年团的创立协助解决会员老化的问题。乡团初期主要依靠乡情维系，但当乡情逐渐淡化，乡团难免面对后继无人的窘境，年青一代尤其不愿意参加乡团组织。雪隆潮州会馆创立青年团，除了吸引更多年青会员的加入，也成功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许多青年团领袖，后来都出任母会领袖，如第一任青年团主任陈亚发就于1977至1981年担任会长职位。

1965年张汉三病逝，黄盛源于1966年再度接任会长之职，至1971年引退为止，历时五年。黄盛源的领导比较倾向内部会务的整顿与改革，诸如会员福

20 杨晴川，〈培才学校史略〉，《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八十四周年纪念特刊》，页41。

21 《雪隆潮州会馆百周年纪念特刊》，页32。

22 〈八打灵培才华小史略〉，《培才华小创校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页17。

利、整编会员名录、设计会旗、会徽与襟章之图案。不过，黄盛源任内最重大的事，应该是1969年“五一三事件”的发生，事实上这是国家与华社的大事，从此国家政策出现极大改变，而且在华人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但黄盛源领导下的雪隆潮州会馆，一如其它华团，对此事件既无奈又彷徨，只能在惨案发生后，“调动众多同乡，四处奔走，劝募义款，登记受灾害影响的同乡”。²⁴“五一三事件”发生后，政府的政策转变很大，对华人尤其不利，特别是1970年代，华团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四 拨云见天：五一三事件以后

1969年“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华人社会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打击与考验，马来西亚无论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与教育，都出现巨大变化。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政府，将“五一三事件”归咎于种族之间的经济鸿沟，于是政府所拟定的政策，“皆以对此事件的解释为政策根据”。²⁵短短几年间，许多不利华人社会的政策与法令相继推出，先是新经济政策，接踵而来的有国家文化政策、工业协调法令、大学学额固打制等。华人社会于此种种，几乎疲于奔命。

但非常难得的是，雪隆潮州会馆在“五一三事件”后，依然站稳脚步，为同乡以及华社服务。1970年雪隆潮州会馆更继设立中学奖贷学金之后，再创办大学奖学金。另外，雪隆潮州会馆更在会务上，做了很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于1971年修改章程，志明会长职位以连续两任四年为限。这个改革非常重要，因为一般上华团领导人的任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造成领袖职位长期遭受垄断，这对会务的推动非常不利。事实上，由于限制两任四年，其结果是有更多领袖可以为雪隆潮州会馆服务。从1891年创会至1971年的八十年，担任总理或会长职位者，仅得九位，而从1971年至2000年的短短三十年，却已出现八位会长。这八位会长，即柯子玉、周信昭、陈亚发、郑良得、郑汉麒、钟廷森、陈来金与张泗清的任期虽短，但贡献却并不逊色。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雪隆潮州会馆在1970年代，即已确立领袖限制任期的作法，可谓走在潮流之前，事实是至今在华人社团、乃至政党，仍为此争论不休。到了2002年，雪隆潮州会馆

23 育苗，〈培才学校之发展轨迹〉，《雪隆潮州会馆百周年纪念特刊》，页87。

24 同前注，页35。

25 何启良：〈独立后西马华人政治演变〉，林水椽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

将会长任期的限制略为放松，但仅由最高连任四年提高至六年，1970年代以前会长领导十数年而不卸任的现象，不复再现。

会长限制任期的作法，使雪隆潮州会馆的领导自1970年代始，显得更具活力与魄力。1971年黄盛源卸任，接任者为柯子玉。柯子玉任期四年，这四年期间，他的贡献相当多。首先，他为了协助更多会员子女升学深造，而于1973年增设大学贷学金。其次，柯子玉为人开明，他领导雪隆潮州会馆期间，积极招揽人才，许多专家学者于此时加入这个组织，1974年，加入雪隆潮州会馆不久的教育组主任郑良树提议设立学术文艺出版基金，这项基金公开给全国华人，消息在报章上发布后，受到评论者的一致赞赏，谥为“有见地、有胆识”的“首创新马两国的记录”。²⁶ 另外，培才学生从1970年起逐年减少，主要原因是校舍周围地段发展为商业区，开辟道路，居民被逼他迁，学生从高峰期的八百多人滑落到一百多人，1975年会长柯子玉呼吁复兴培才学校，获得热烈反应，且多次共商对策，定下大纲。整体而言，柯子玉的领导，还有一个特点，他很重视青年团的活动，并且鼓励年青人加入雪隆潮州会馆，使会馆加添青春气息与活力，并且在会务上显突出一种有朝气的劲力。

柯子玉的继任者是周信昭。他的任期从1976至1977年，仅担任会长为期两年。他在任上，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件。其一，1976年10月中，国家文化咨询理事会在丁加奴州召开会议，征求各社团对国家文化的见解，雪隆潮州会馆也在受邀之列，周信昭以会长身份出席。当时主张马来化与回教化的国家文化政策已经出炉。周信昭在会上发言，陈述华人的心声，认为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应该溶铸中华文化菁华于内。其二，在柯子玉任上提出的复兴培才学校计划，于其任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1977年5月雪隆潮州会馆成立由张泗清为首的培才学校建校委员会，觅地建校，以使备受环境限制之培才学校得以脱离窘境。

陈亚发接任为会长时，雪隆潮州会馆显现更强劲的奋发精神。陈亚发于1977年上任，1981年卸任。在这四年期间，陈亚发为雪隆潮州会馆以及各地潮人做了许多合纵连横，开拓新舞台的工作。其一，1980年6月，兼任马潮联会值年主席的陈亚发领团，先后访问香港、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亚

²⁶ 郑良树，〈学术文艺出版基金的回顾〉，《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八十四周年纪念特刊》，页167-170。

各地区，邀请五国潮人团体，出席马潮联合会第四十六周年纪念大会，同年于8月18日假云顶高原举行“东南亚潮团联谊座谈会”。这项历史性的座谈会，促成“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诞生。因此，也可以说，马来西亚是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发源地。²⁷ 其二，1981年陈亚发与当时马潮联合会常委会主席刘玉波发起组织“马潮企业私人有限公司”，后来易名为“马潮控股有限公司”，以汇集马来西亚潮人资金，积极投资现代化企业。²⁸ 另外，有关培才学校迁校一事，陈亚发也颇有功劳。1979年，教育部批准在白沙罗百乐镇，拨地兴建学校。建校委员会即刻动工建校，没想到校舍建至二楼，却因为政治因素，该地被教育部收回。会长陈亚发多方极力争取，四处奔波，多次向当局交涉，遂得偿所愿，于1980年获教育部另外拨出八打灵东南亚花园一块占地三英亩的地段，并批准资助建筑基金十万马币，供建筑新校舍之用。²⁹

郑良得于1981年出任会长，任期至1985年。他担任会长的第三年，即1983年培才学校迁入新校舍。这次迁校，对培才的发展而言，绝对是正确的选择，目前培才已是学生数以千计的名校，培才能够有如此表现，雪隆潮州会馆诸领袖功不可没。郑良得任上尚有一件大事。1985年，他同时以马潮联合会的常委会主席身份率领雪隆潮州会馆大力协助马潮联合会筹措百万元经费，调动大批人力，在云顶高原主办第三届国际潮团联谊会，出席代表共有一千两百名。这样的联谊会让雪隆潮州会馆在会务的推广上，具有更宽广的视野。

郑汉麒的任期由1985至1990年。1987年雪隆潮州会馆在他领导下，响应马潮联合会倡议的推行“建立书香社会”运动，而决定在会所设立图书馆。郑汉麒出任会长期间，最重要的事，应该是提出发展前培才学校校址地段，以充实会馆之经济来源。他成立小组积极研究如何发展上述地段，并且付诸行动，向市政局申请。1985年8月市政局只是批准将该地段转换为“限制性商业地”之后，他继续积极争取，1986年10月终于获得市政局批准在上述地段兴建商业大厦。

钟廷森的任期仅从1991至1992年，但在短短两年间，他将兴建商业大厦的计划变成事实。雪隆潮州会馆的财务向来不算太过充裕，虽然有力量设立奖

27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马来西亚华团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1999年，页52-53。

贷学金，资助贫寒子弟，但每年只发四份大学奖学金、四份大学贷学金、十份大学先修班奖学金、三十份中学奖学金，以及近四百份小学学业优秀奖。³⁰ 不过雪隆潮州会馆拥有的锡兰巷培才旧校地，却价值不菲。钟廷森上任后积极推动培才旧校址地段建大厦计划。钟廷森是工商巨子，他的计划是由他拥有的金狮集团属下的合营制钢与马潮联会属下的潮联控股公司合作成立一间称为伟胜威尔（Vision Well）的公司以发展上述地皮。这项发展计划由合营制钢负责管理，兴建两座分别为十八层及三十八层的办公楼，以及一座拥有三百五十间客房的酒店，建筑费用近一亿六千万马币，计划完成后，十八层的办公楼将属雪隆潮州会馆拥有。当时估计这座办公楼价值三千七百万马币，若所有空间都供出租之用，雪隆潮州会馆每月可获得三十万马币的租金，到时将成为马来西亚财力最雄厚的会馆。³¹ 这项计划提出后，获得雪隆潮州会馆同意，并于1991年签约。但在钟廷森的任期间，这项发展计划还没有正式动工。

陈来金的任期由1992至1996年。1995年，陈来金上任三年后，兴建新大厦的计划才正式动土。在大厦动土礼上他致辞时表示，大厦预计1998年建竣，一旦大厦落成，雪隆潮州会馆将拥有自己的大厦，经济来源将会更加充裕，雪隆潮州会馆可以为华文教育贡献更多，他甚至提出筹办潮州学院的主张。³² 陈来金对新大厦显然寄以厚望。事实上，新大厦建竣后，对雪隆潮州会馆今后的发展想必有很大的帮助。

1996年由1960年代领导雪隆潮州会馆的第七任会长张汉三之子张泗清接替陈来金的会长职位。其实张泗清从1977年起至今，一直担任培才学校的董事长。他出任会长期间，预计1998年竣工的新大厦未能如期完工，后来甚至因故搁置工程。张泗清虽然不能于任内看见新大厦的落成，但他一如陈来金，非常关心新大厦的进展，以及新大厦建竣后的发展，他认为新大厦落成后，不但要守业，还要创业。³³ 作为雪隆潮州会馆会长与培才董事长的张泗清，在其任期内，最值得欢庆的，应当是1999年底全国大选前，培才学校成功利用时机争取开办分校一事。2001年初，培才二校在八打灵万达镇的新校舍正式开课。³⁴ 开办分校对培才、对华社，都是一件大事，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基本上是多灾多

29 育苗，〈培才学校之发展轨迹〉，页88。

30 《南洋商报》，1991年8月15日。

难，雪隆潮州会馆之守护培才，于华教可谓功德无量。

张泗清卸任后，目前是由郑浩生出任会长。郑浩生上任后，雪隆潮州会馆的新大厦旋即复工，估计近期内可以完工。显而易见，从这几任会长的表现来看，近三十年来，雪隆潮州会馆的发展是稳步前进，在很多方面都突破地缘组织的限制，即将完成的新大厦相信会将雪隆潮州会馆带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

五 结语：没有总司令的马来西亚华团

总而言之，雪隆潮州会馆在它一百一十余年的历史中，不断随着环境与时局的转变，而调整步伐。就以创办培才学校为例，从1923年谐街的旧会所到安邦路的新会所，从锡兰巷的旧校舍到八打灵的新校舍，然后又从一所变成两所，期间不知历尽多少艰辛，却能找到新的出路，八十年来一直坚持为华社保住一个华文教育的据点。锡兰巷的培才旧校址，容不下一间华文小学，却可以换来一座价值几千万的现代化大厦。虽然雪隆潮州会馆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地缘性组织，却可以推动马潮联会和国际潮团联谊会的成立。当然还有不分籍贯的学术文艺出版基金的创设，都超出一个地缘性组织的限制。这个出版基金虽然仅仅办了三届，却给其它华团带来很大的启示，雪隆潮州会馆绝对是马来西亚华人乡团的其中一个典范。

然而，必须再次强调，雪隆潮州会馆只能算是马来西亚华团的尖兵。它不能与层次更高、组织代表性更广的华团相比。但是在错综复杂的华团网络里，代表性仅仅只是形式上的优势而已。以华团总司令自居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却不能将全国华团集于一堂，更别说是对华团发号施令了。华团的一个小尖兵，有时候甚至比一个只具形式的总司令更加有能力造福华社。

31 同前注。

32 《南洋商报》，1995年9月4日。

33 《星洲日报》，1998年4月16日。

34 《南洋商报》，2000年12月2日。

